

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

• 董瑞麒譯

〔本文譯自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亞太情勢報告》(Asia-Pacific Report) 第二章。——編者〕

圖一：世界GNP的比重



資料來源：Long-Term Outlook Committee, Economic Council,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Government of Japan. *Japan in the Year 2000* (Tokyo: The Japan Times, 1983). Adapted from Figure 2-1-6, p. 42.

註：東亞太平洋地區包括東亞、東南亞、中共與南太平洋，但不包括南亞。

在環太平洋地區出現一個世界新工商業、財富中心，足以與工業革命的原始基地北大西洋地區相匹敵。這一切所未有的發展是在極短期間形成的。廿五年前無人能預測日本在八十年代成爲世界汽車產量最多的國家、南韓爲世界鋼鐵和造船的主要中心、馬來西亞爲世界半導體的主要生產國。

一九六〇年後東亞市場經濟的國家，其經濟年平均成長率逾百分之六，而中共及南亞諸國稍爲緩慢，這樣的經濟表現實勝過世界其他地區。此一趨勢倘持續發展下去，則至本世紀末西太平洋國家的總體經濟將媲美西歐或北美（見圖一）。

亞太地區的經濟日本首屈一指，日本約佔該區一九六〇年收入的二〇%、世界收入的三%；一九七五年則分別提高至五〇%與九%。在此期間，日本脫離開發中國家而進入工業國家之林，結束了百年來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的過程。日本躍進先進國後，成長率遂開始下降，從五十、六十年代一〇%，下降到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後的不到五%，未來將低於東亞或東南亞的鄰國，惟至公元二千年日本仍將佔亞太地區商品與勞務總產值的四五%。

唯有香港與新加坡可能繼日本之後，在本世紀末成爲工業國。自

七十年代中期起，經濟快速成長中心已由新興工業經濟（南韓、中華民國、香港、新加坡），向西與向南轉移至資源豐富的東協（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及中共。在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期，過去低速成長的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與產值的基礎後，國民收入開始躍升。

許多亞太國家經濟表現卓越，然而人民仍相當窮困，其中七五%的人散佈在低收入國，尤其在中國大陸與南亞諸國，年平均國民收入在四百美元以下（見圖二）。目前最重要問題是能否維持經濟持續成長（一如日本過去，或若干東亞及東南亞國家一般）、亞太低收入國的廣大人民生活遠景又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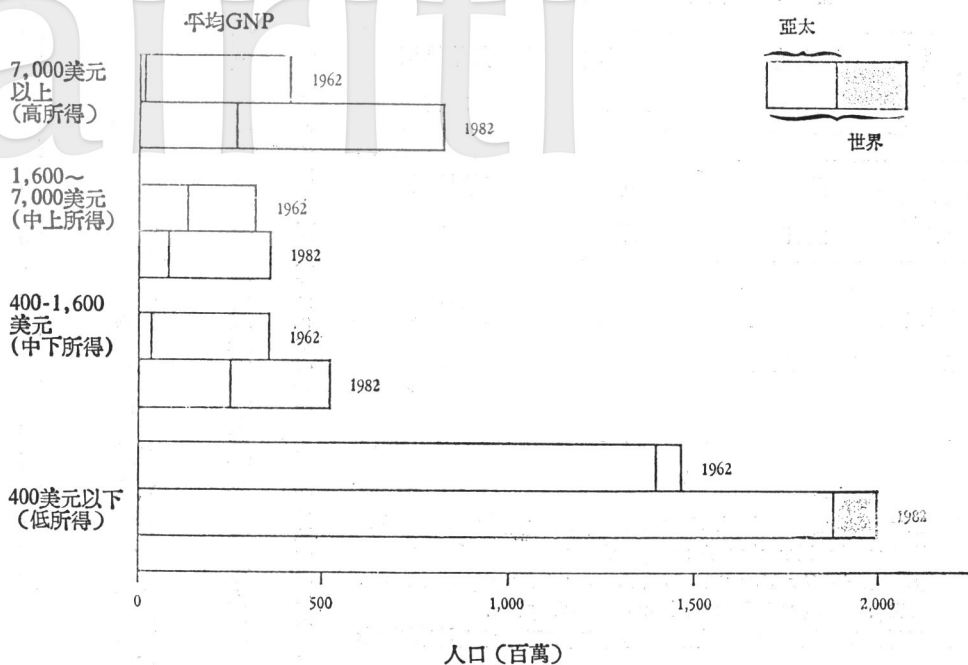
本文將分析下列亞太七類國家的過去經濟表現及現況：新興工業經濟國、資源豐富的東協、低收入東南亞國家、中共、南亞國家、太平洋島嶼國家。根據綜合地理與經濟特質而加以分類。因為日本及新興工業經濟通常被視為該區的發展典範，故首先分析他們經濟成功的要素。

一、東亞

1 成長因素

如何達成經濟成長，這一問題的答案，理論家或實踐家迄無定論。顯然這需要公私部門大量投資於公共設施。這便又需要高儲蓄率及有效管道將儲蓄轉化為生產性的投資，努力必須訓練有素，技術必須提昇，外匯必須增加俾採購國外的原料與技術，政府必須提供穩定的政治環境及可預測的政策穩定，俾激勵經濟活動。

圖二：按所得分類的亞太與世界人口，1962和1982年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64*, New York, 196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1984.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Atlas*, Washington, D. C., 1985.

這一切沒有一國比日本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做得更成功。他們爲什麼能做得如此成功呢？在各種成功的因素中，何者重要，實人言言殊；然而各方對何者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則有一致的看法。

(1) 他們是國際導向的經濟，利用世界經濟有利的環境來克服國內有限的市場，對於出口給予租稅與貸款的優惠，監督出口機會，採取實用的匯率來鼓勵出口。

(2) 戰前他們的經濟均已開始現代化，尤以日本最爲顯著，在三十年代已奠定了相當工業基礎，足以發動大戰，然而大部份基礎均毀於戰爭。戰後在基本工業設施的發展、管理經驗與技術的獲得、努力的培訓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南韓與臺灣雖經歷被殖民的痛苦經驗，却在殖民期間發展了鄉村道路、灌溉、電力、農會等基礎設施，爲促進農業生產與工業均勻分佈奠定基礎。新加坡和香港爲殖民期的轉口貿易中心，早期便建立商業和教育等方面的基礎設施。

(3) 政治上一致同意經濟發展係國家建設的首要目標。除香港外，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規劃扮演著強有力的角色。不論在戰前或戰後，迎頭趕上西方爲日本舉國一致的目標。六十年代後期，這一目標基本完成後，才開始重視環境保護與休閒。在南韓與中華民國，經濟發展有助益於政府政治目標的合法化；新加坡也強調經濟現代化爲國家求生存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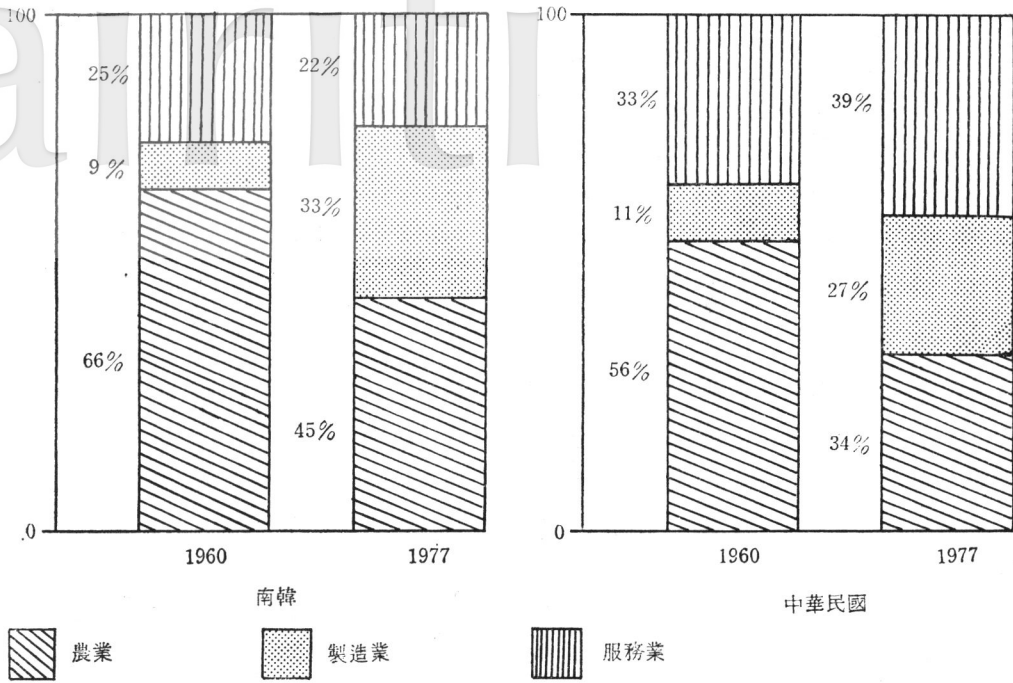
論者往往認爲這五國共同具有激勵經濟發展的社經特質，包括：(1) 不存在富有地主階級，他們經常反對工業化，而不願將剩餘農業資金用來提高生產力。(2) 勞工運動比較微弱。(3) 強有力的經濟官僚，享有相當大的獨立決策權。除香港外，政府在早期工業發展扮演特殊角色，政府與企業界關係密切，保護民族幼稚工業、大力促進出口、政府指導信貸與外匯來保護工業、建立國營企業。(4) 高度政治穩定。上述五個高速成長的經濟，權力均集中於中央，或由保守政治勢力所統治；贊成與西方保持密切的連繫，其中有幾個實施權威統治。穩定意味著政府政策上的可預測與連貫性，由此可激勵私人儲蓄與長期投資，使利潤仍保留於國內以供投資。朴正熙被殺引發政治不穩，以及「中」英有關香港協定未簽定前，帶來香港經濟衰退。(5) 文化因素。這是個最不可捉摸的因素。這五個經濟均受儒家價值體系的影響，重視勤勞、儲蓄、自律、務實、企業精神與教育。在沒有其他條件的配合，儒家價值並不必然厚植經濟發展，但却可鼓勵這一發展的趨向，有助於促進此種公共經濟政策與私人行爲模式之形成。

2、新興工業經濟國

最近廿五年來，中華民國與南韓進行重大的結構改變。一九六〇年二國仍被形容爲以自然資源爲主的經濟，然而今日則被公認爲工業產品出口型的經濟，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一九六〇年韓國的農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三七%、中華民國三三%；而該年以農產品爲主的初級產品佔南韓的八六%、中華民國的七三%。然而到了一九八三年，農業佔南韓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四%，中華民國的九%。而南韓工業佔國內生產總值却從一九六〇年的二〇%增加至一九八三年的四〇%；中華民國則從二五%提高至四四

圖三：南韓與中華民國的經濟結構之變化

1960~1977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9*,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目前二國工業產品佔出口的比重均逾九〇%。從未有其他開發中國家在這樣短期間經過這樣大的經濟結構變化（請參閱圖三）。

這一經濟結構的轉變最初源自農業成長率的提高，這樣一來，剩餘勞力得以轉移至製造業，並得以累積儲蓄，將之轉入生產性的投資。六十年代初期，南韓與中華民國採行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策略，經由進口的管制或補貼來扶持國內製造業的成長。然而這一策略很早便為出口導向策略所取代，因後者能充分利用勞力比較利益來發展工業品的出口。這並不表示放棄進口替代，而是說廢除或改變阻礙出口的政策。出口商享有貸款優惠、免除資本財和原料進口的關稅、廢除外匯管制與多重匯率、解除許多進口數量的限制。

這二個新興工業國家的工業出口導向策略不僅克服國內市場規模狹小的缺點，而且成為世界上貿易倚存度最高的國家。他們雖短缺基本工業原料，却充分地利用有紀律的充沛勞力，一躍而為世界經濟的製造業中心。嗣後人口成長開始下降，農業剩餘人口逐漸消失、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產品遂喪失比較利益，代之而起的是資本或技術密集工業。

中韓兩國目前所面臨的經濟重大挑戰是過份倚賴外貿，以及勞力密集工業轉型所衍生的不確定現象。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工業產品的外銷，自然倚賴海外的原料和燃料，因此他們極易遭到國際經濟波動的損害。七十年代二次石油危機威脅有利於他們的供應價格，他們雖遭遇短期經濟困難，仍能以增加出口來彌補。八十年代經濟衰退，他們更需要做艱苦的調整。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期間，二國出口再度順

暢，渡過了危機。但出口暢旺却增加對美國市場的倚賴，一九八四年美國市場佔南韓出口的三五%、中華民國的四九%。一九八五年美國經濟復甦步伐放慢，又給二國帶來經濟問題。

出口的捉摸不定，擴大了工業升級的長期問題。二國的經濟當局相信：需發展資本更密集或技術更密集的工業，來彌補勞力優勢的喪失。然而中華民國的企業界，擔心新工業的壽命究能維持多久，初期投入資金要相當龐大，才能建立足與日本和其他工業國家相匹敵的新生產線，因而降低了投資意願。

南韓可能面臨更嚴重的調整問題。與中華民國比較，南韓國內工業受到更多的保護與補貼。南韓顯然採取日本的發展路線，大力發展鋼鐵、造船、汽車等重工業，故必須作重大的投資，因而忽略了農業與小企業的發展。大企業佔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由少數企業精英所壟斷。工業化初期儲蓄率不高，這一點迥異於中華民國。雖然儲蓄佔GDP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一%提高至一九八三年的二六%，投資却超過儲蓄，故需向國外大量舉債，並展緩若干經濟計劃、諸如改善港口設施、水力與核能發電、期能避免再舉新債。

香港與新加坡為新興工業的城市經濟。平均國民所得（一九八三年分別為六千美元與六、六一〇美元）劇增，係開發中地區唯一與工業國家拉近的國家和地區。二地均是金融與服務業的區域中心，然而採行的發展策略却大為不同。香港屬於自由貿易經濟，殖民政府深信政府管理經濟愈少愈好。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實施短暫的進口替代策略，不久又廢棄，俾利出口成長。政府則更積極地參與經濟發展、成立國營企業，並強制釐訂薪資水準。香港的投資由本地資金所帶動，但新加坡的工業化則借重外資。

八十年代初期經濟陷入衰退，加上其他特別原因，最近香港與新加坡的經濟遭遇困境。雖然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期間，對美國出口帶動香港經濟成長九·六%，然而「中」英有關香港未來的談判遷延不決、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因而導致資金外流。此外，香港是中共經濟成長與開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動盪不安，新加坡反因而受利。但是一九八五年新加坡遭遇嚴重困難，其石化與煉製工業因世界供應過剩而陷入困境，中東、印尼、馬來西亞新增煉製設施威脅其第三煉製中心的地位。電子工業係新加坡另一高成長的工業，然而主力是西方子公司，也因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工業進行重大重整而陷入衰退。產能過剩也大大影響造船與維修費的收入。

雖然新加坡八十年代中期的衰退或許是短暫的，但却顯示了小型經濟升級的困難。在七十年代後期，政府鼓勵工資的提高、優先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若干人士批評此一政策造成新加坡勞力過於昂貴。

二、東南亞

1 資源豐富的東協國家

東協六國成員中，新加入的汶萊係生產石油的小回教國家，年平均國民所得約二萬美元。另外是新加坡，如上所述係一快速成長的新興工業國。其餘四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為中等收入國家（引用世界銀行的分類）。一九八三年印尼平均國民所得為五六〇美元、馬來西亞一、八六〇美元。四國均盛產初級商品，農產品與礦物係其經濟支柱，重要的有石油（印尼、馬來西亞）、鋁、橡膠、棕櫚油、椰子、稻米、糖與澱粉樹薯。

這四國的經濟成長率頗高，也正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然而速度却没有新興工業國家快。整體經濟表現以泰國最為傑出，一九六〇至一九八二年期間，平均國民所得實質成長率高達四·五%，馬來西亞也有四·三%、印尼四·二%。後二者也表現不錯，惟印尼在一九六六年前經濟成長緩慢。菲律賓表現最差，在同一時期，平均國民所得成長只有二·八%。然而就其他地區而言，這樣表現已差強人意；不過同其鄰國比較，則大為遜色。一九八三年後經濟危機更使之黯然失色。

最近廿五年來，四個資源豐富的東協國家，農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逐漸降低，目前約在二〇%至二五%之間。惟農業人口仍佔勞動力一半以上。在同一時期，雖然農產品產量比人口增加還快，但只有泰國達到糧食的自給自足。七十年代馬來西亞引進高產品種、加倍施肥、政府優先開發農村（農村主要人口為馬來人，擁有相當政治權力），結果平均糧食產量增長五〇%。泰國農業成功地進行多角經營，由稻米擴展至高價值的經濟作物，諸如澱粉樹薯、玉蜀黍、鳳梨、蔗糖、養殖。惟泰國糧食產量的提高，主要倚靠耕地的擴增（目前已到達極限），其主要作物的產量仍比東南亞其他國家低。目前農業策略轉移至耕地生產力的提高。八十年代印尼達到稻米的自給自足，係亞太地區農業卓越表現之一。最近廿年平均產量增長五%，高於東南亞平均數量。這主要歸功於使用早熟種籽、提高化肥使用的誘因、灌溉擴增得以進行複種。菲律賓亦致力於稻米的自給自足，七十年代完成此一目標。一九八〇年後，農業及經濟其他方面均走下坡，因此還斷斷續續進口稻米。

農村經濟發展可為增長中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並增加對製造品的需求。除了印尼外，製造品的出口日趨重要，一九八二年佔菲律賓出口值的四九%（一九六〇年僅四%）、泰國的二九%（一九六〇年二%）、馬來西亞二三%（一九六〇年六%）。然而目前絕大部份製造業產品仍留用供應國內市場（泰國九〇%、印尼九五%）。

菲律賓為東協國家中第一個採取進口替代策略的國家。在五十與六十年代，使用高關稅、滙率管制、高估滙率來保護國內工

業。雖然六十年代開始解除管制，而在七十年代也出現高速經濟成長，農村經濟扯了工業發展的後腿，無法創造足夠的收入或儲蓄來扶持後續成長。當國內市場趨於飽和後，工業的擴張便失去動力。認清這一點，非政府在最近十年試圖促進製造品的外銷，然而工業猶不利於資本密集產品與消費成品的生產，迄未能擺脫早期發展的後遺症，或降低對本國效率低落工業的保護程度。

近年來銅、糖、椰子等產品的貿易條件惡化、通貨膨脹高漲、外債沉重衝擊菲律賓的經濟。一九八三年八月艾奎諾被刺及資金外流更火上添油，金融體制瀕於崩潰邊緣。一九八四年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金融挽救方案談判，需要配合許多政治上不易推動的改革。菲律賓業已允諾讓披索貶值、採取預算緊縮、減少貿易限制、廢除若干農業上的壟斷。非政府是否有能力執行這一方案仍在未定之天。同新興工業國家相較，菲律賓經濟官僚的力量微不足道。遠大的發展目標往往懾服於政治權威人士的私利。

與菲律賓相較，印尼經濟隨七十年代油價調節上升而復甦，石油係其主要出口商品。蘇卡諾於一九六六年下臺後，政治趨於穩定。同時進行總體經濟改革，譬如外匯市場的自由化、預算的控制。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二年期間，工業成長一一%。這主要歸功於油價上揚和經濟計劃。另一方面限制進口、大量補貼大型資本密集國營企業，諸如蘇門答臘阿沙漢鋁廠、色拉貢冷軋鋼鐵廠。荷蘭殖民留下來的強有力的官僚管制為印尼經濟的特色。

上述措施對於提高印尼製造品的競爭力並無多大補益，而保護國內市場的導向迄無變更。資本密集工業所提供就業機會，仍不足以吸納不斷增長的勞動力或刺激相關的經濟活動。輸出石油產生正負二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可取得外匯來支持開發計劃；另一方面却使印尼貨幣維持在高價位，因而削弱其他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及本國製品在國內的競爭力。

八十年代油價大幅滑落，印尼幣貶值，停建若干大型計劃、削減燃料與稻米等消費品的補貼，並開始改革金融、稅務、關稅和港口管理。出口多樣化也獲得若干績效，紡織、合板快速成長。資源豐富和勞工低廉是印尼的資產，未來成長的速度與方向取決於如何使用這些資產。油價滑落後，在比較不利的經濟環境下，印尼表現出具有能力向新政策的方向邁進。

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二年期間，泰國與馬來西亞工業穩定成長，年平均達九%。製造業首先是初級產品的加工，諸如菜籽油、木製成品、橡膠製品。最近又出現電子、紡織等新產品，大部份是輕工業品，惟少用本地原料、充分利用當地勞力優勢。尤其是馬來西亞，把重點放在自由貿易區的出口製造品。二國企業界仍由商人而非工業家所控制，或許是部份因為這一原因，除了少數例外，進口保護並不算嚴重。

泰國政府正強調發展大型工業計劃。馬來西亞雄心勃勃要製造汽車，泰國擬在曼谷以外的東海濱上，建立一個新工業中心（毗鄰新天然氣田），冀能強化而非取代正在發展中的輕工業及其成長誘因。二國國內仍為這些計劃爭論不休。反對者主張：靠進口原料、設備、技術與管理技術的躍進，脚步跨得未免太大，背離比較利益，不顧限制，到頭來可能像南韓一樣必須進行調整。在經濟發展許多方面，上述東協四國表現卓越。他們降低了人口成長率，改進教育制度，提昇公共服務品質。在社會福利方

面也有相當進步，包括提供安全無虞的飲水與醫療服務，增加食物供應。另一方面，不像東亞國家一樣，公平地分享經濟成長的利益。世界銀行分析七十個國家所得分配資料顯示：最窮的二〇％人口只佔馬來西亞家庭收入的三・五％、菲律賓五・二％、泰國五・六％、印尼六・六％。經濟快速成長可增加窮人的絕對收入，但幅度不如中收入或高收入者，也沒有那樣直接受益，因此將擴大國內所得差距。這一點已為本區域政府決策者所認識，正設法解決。

除開馬來西亞外，東協其餘三國均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一九八三年儲蓄佔菲律賓GDP的二〇％、馬來西亞的二九％，比同樣社會經濟水準的國家的平均價值略高；而投資水準也算相當高，分別佔GDP的二一％與三四％。除非菲律賓外，大部份國家謹慎向國際金融市場告貸。一般而言，政府均力圖改善經濟。然而與新興工業經濟國家比較，東協四國的經濟成長較慢。部份原因係農業部門所佔比重較大，亦成長緩慢。另外，當社會日趨多元化時，成長目標往往同政治要求背道而馳，即國內反對成長的政治力量的掣肘，使形成強有力經濟官僚的機會愈來愈小。在這種限制因素下，他們的經濟表現卓越。除開菲律賓外（在惡劣國內外環境下，經濟官僚正設法鼓勵進行基本改革），預期此區域將持續高速成長。

2 低所得的東南亞經濟

緬甸、越南、柬埔寨、寮國等低所得東南亞國家，人口逾一億。自一九六二年來，有三千七百萬人生活在社會主義下。他們是世界生活水平最低的幾個國家。一九八三年平均國民所得一八〇美元。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期，經濟停滯不前，隨後是逾六％的年成長率。這是由增加稻米產量與出口成長所致（雖然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出口仍只有戰前水準的三分之一）。外債不斷增加，一九八五年達廿四億美元，還債付息佔出口值的四五％。因此之故，緬甸擬分散出口市場，並尋求國外援助。目前緬甸沒有外來投資，雖需外匯，政府並不擬引進外資。理論上，一九六二年私有企業被收歸國有，惟目前仍佔生產的一半。又現行經濟計劃仍高喊實質增加公共部門的比重而減縮私有部門。其他社會經濟發展指標，諸如平均壽命、自來水供給率、醫療設施，低於東協國家的水準。

越南外債也相當嚴重，但吸進外資並不成功。統一後經濟發展的希望，因一九七八年入侵柬埔寨而破滅。據估計四〇％以上的預算投入國防。越南經濟困難重重，化肥與軍用石油短缺、交通設施不足、電力短絀。最優先發展的經濟項目為農業，像中共一樣，越南也實施家庭或小集體的承包制。

寮國和慘遭戰火破壞的柬埔寨，經濟遠景黯淡。二國最重大的經濟難題為提供足夠的糧食，目前大量倚靠外援、大部份來自社會主義國家。柬埔寨農田肥沃，長期的潛力不小。

三、中 共

中國大陸面積遼闊，自然資源豐富，與東亞其他國家呈鮮明的對比。就絕對數字而言，中共可視為工業巨人，惟一九八三年平均國民所得只有三百美元，係世界最低所得國家之一。現代化和體制改革，旨在一九八〇至二千年之期間國民收入翻二番，最終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俾廿一世紀中葉趕上工業國家的水準。

中共經濟發展史別樹一幟，而充滿了崎嶇不平。中共自一九四九年控制中國大陸，結束了卅年的內戰和外國侵略。一方面由於本身的選擇，另一方面外來環境壓迫使然，中共從事經濟恢復必須從根做起。在五十年代，除了蘇聯援助外，幾乎沒有外援。在史達林中央計劃控制經濟模式下，重點擺在資本密集工業和大型計劃上。這些計劃包括由蘇聯進口的成套設備，需由農村儲蓄來支付。中共犧牲農業而建立一個綜合工業體系。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開始了廿年斷斷續續的動亂。在這一長期不穩定期間，主要經濟特色為力求自力更生、並動員羣衆來達成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破壞了計劃。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高喊平等與思想意識的純潔，却破壞了經濟、法律、教育計劃和行政體制。農村的集體化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和生產意願，農業年平均成長約三%，幾乎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外貿大幅下降。官方的經濟成長率逾五%，然而却大量浪費資金、物資和人力。

一九七八年在鄧小平領導下，扭轉了發展方向，由重工業轉為四個現代化（農業、輕工業、科技和國防），並決定縮減投資比重，積累由高達三〇％降低為二五％，俾容許增加消費。也開始調整經濟、扶持農業與消費品的生產。一九七九年發動重大經濟改革，尤其是農業生產權的下放。同時給予農民與工人物質刺激。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期間，農業產值年平均增加八%，比過去廿五年大二點五倍。農村平均收入倍增，建築業因此蓬勃發展。消費品與農業投入的需求遽增。個人儲蓄增加，彌補了「國家」在鄉村投資的不足。

農村改革的成功，鼓勵中共領導階層將改革擴大至城市。城鄉繁榮後，消費品、化肥、農業設備等農業投入之需求也隨之遽增。工業遂無法滿足這一需求。中共當局將企業大量生產廢品與無法提供充裕的暢銷品，歸咎於不合理的舊價格體系。殘缺不全的舊分配辦法，阻礙了產品與物資流通至消費者與生產市場。

針對上述問題，一九八四年十月又宣佈一系列的重大政策決定。四年來的城市改革審慎試點，讓價格逐漸上升，反映生產要素價值與相對稀少性。根據這一經驗，價格由國家管制的商品自一二〇種縮減至六〇種。市場機制配合指令計劃將指導日趨強大的經濟活動。經濟政策的運作工具，諸如租稅、利率、價格、工資等等，不斷補充總體經濟下指令運作的不足。另一方面，強調

權力下放於個體經濟單位，企業應能自行決定工資、生產、研究與銷售，逐漸掃除黨政干預企業經營；鼓勵國營、集體與個體企業之間的競爭；工資將反映工人與企業的實際表現，期能像農村一樣提供工人的工作誘因。

與國內改革同步進行，中共也設法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以尋求更大的經濟刺激。外貿由一九七八年的二五〇億美元增加至一九八四年的五百億美元。雖然世界貿易在這幾年的成長步伐放慢，目前出口佔GDP的比重，官方報導約九·六%。按東亞或東南亞標準，依然偏低，但却反映擁有龐大國內市場的大陸國家若干程度的對外導向。出口有一半到亞洲、西太平洋；而三分之一進口也來自這一地區。中共也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包括管理技巧。一九七九年設立四個經濟特區，一九八四年又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爲了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在租稅、關稅、工資和土地費用方面也提供優惠。外人獨資企業也在允許之列。惟法制不健全、官僚體系層層的束縛、國內市場的關閉、利潤不易滙回母國，使實際投資的成長幅度不大。在八十年代中期，估計約三五〇億美元。

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比較，中共最近的改革與調整，確是一種全面而大膽的嚐試，冀能提高經濟效率與生活水準。然而改革展開後，却不斷地威脅強大的國內既得利益者。堅不可破的黨政官僚要讓出經濟管理權，工人擔心價格改革與取消補貼將使他們的實質收入減少、國家不再保障工作權可能因而失業。在最近權力下放、市場導向下，若干企業害怕無法與他人競爭。因此中共當局不斷面臨此一挑戰——如何將改革的負面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

除了上述敏感問題外，中共也遭遇若干經濟上的基本困難。例如交通、能源、通訊等頸瓶限制了未來的發展，因此特闢新稅源來支持這方面的大型計劃，也擬增加外債來補充國內儲蓄的不足。中國大陸人口縱使年平均只增加一%，至公元二千年人口將至少逾十二億，將對於目前已相當緊張的交通、住宅、衛生資源構成強大的壓力。而只有教育上質的改善，才能添補熟練工人、科技人員與管理人員的嚴重不足。中共當局認清了這些挑戰，同時顯示具有相當能力來處理這一系列問題，其成功與否將對亞太地區形成重大的影響。

四、南亞

南亞次大陸正掙扎於經濟發展的老問題。人口快速增長（農村窮人佔主要部份）、識字率低、所得差距大、農業成長緩慢、及其他多種限制工業發展與提高就業率的因素。南亞總人口約相當於中國大陸。絕大多數南亞國家平均國民收入均低於中共，被列入世界最低所得的國家。

迥異於東亞國家，南亞從未出現快速經濟成長。惟在外來優惠援助下，最近廿年來糧食產量取得相當的進展。工業生產則令

人失望，尤其是印度，早期投入相當大的資金於重工業的進口替代。近年來南亞政府開始放鬆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提供私人部門更多的生存空間。致力於工業現代化與促進製造品的出口，將可發揮高成長的潛力。

南亞經濟福祉的關鍵與指標一直是農業。農業佔勞動力的七〇%，GDP的三分之一。由於國內導向的工業與勞務，農業收成的豐歉遂決定總體經濟的表現。過去投資於大型灌溉計劃、蓄水設施、化肥和高產糧食作物，才使目前農產品的產量達到高峯，而不致受季節風的影響。但是農村人口密度高、工人勞動生產力低，故製造業部門無法吸納農村大量無地失業者。經濟作物及農產品加工業也不能提供足夠的新就業機會，得以扶持一般經濟發展。舉例而言，印度糧食雖能自給自足，仍然進口大量茶籽油。

南亞大國的工業幾乎都供應國內市場。在五十年與六十年代，印度與巴基斯坦重工業化。結果，提昇了工業，並促進工業的多样化。然而，同東亞與東南亞的市場經濟國家比較，南亞的工業政策主要仰賴政府來規範與經營。如此，不僅不能鼓勵私人企業展開激烈的競爭，政府反而限制了外來與國內的競爭，刻意保護被扶持的工業。

印度偏向發展資本密集大型工業計劃，由政府給予財政支持，因此佔用了一大部份的投資資金。縱使具有龐大國內市場的優勢，效率低落和官僚體系的層層束縛，使得工業成長緩慢。除了進口替代策略外，政府並未大力拓展外銷，因此不易取得進口國外技術或原料所需的外匯。而國產原料、電力與運輸工具的不足也是工業發展的嚴重限制因素。而這些問題的形成主要是公共部門效率低落和管理不良，而非設備或工廠的不足。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二年期間，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僅增加二個百分點，從一四%提高至一六%，大部份增長都發生於六十年代初期。這是亞洲發展中經濟，結構變化的速度最慢的國家。但版圖大，使印度工業仍排名於世界十大之列。

南亞國家正試圖強化私人企業，提昇公共部門的效率與改進其管理，促進農產品與製造品的輸出。巴基斯坦政府在一九七七年後，錫蘭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後發動新改革，而政府內的既得利益者，却造成基本經濟改革困難重重。巴基斯坦的第六個五年計劃，自由開放進口若干原料與資本財，來刺激國內工業的發展，並擬在喀拉蚩設立出口加工區來吸引外資。在八十年代初期，印度也採取一些臨時性小規模的經濟自由化措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大選，拉吉夫·甘地上臺，當時傳言新總理將改變印度經濟政策，消除政府低效率、擴大競爭、重視生產力。

第七個新五年計劃的經濟策略正在規劃中。公共投資佔支出的比重從過去的五〇%降為四七%，這是首次縮減公共投資。爲了保持最近五年的經濟成長，印度勢必加強出口，並擴大國外商業貸款。

南亞次大陸國家遭遇的經濟難題相當嚴重，尤以尼泊爾和孟加拉爲最。人口增長猶偏高；缺乏競爭使國內工業成長緩慢；高商業稅、政府的管制與牌照發給都妨礙私人企業的發展。處處提防外人的心態，也減少了出口與國外生產性投資的機會。在印度

、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等國，往往基於倫理與其他政治困難而推翻經濟政策。

然而吾人不應忽視南亞的基本力量與頗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印度、巴基斯坦兩國業已能發展石油生產事業，未來也可能將繼續如此。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較，南亞國家的外債並沒有沉重到不可擔負的程度，他們尚有在商業市場籌措到投資資金的潛力。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國內市場較大，尤其是印度，擁有不少的技術與商業人材。惟最重要的莫過於愈來愈認清，過去經濟策略並不成功，遂愈有興趣探索新方向。

五、太平洋島嶼

南太平洋廿二個國家與領土，同亞洲最小的開發中國家比較，也大異其趣。整體而言，全區的國民生產總毛額只有新加坡的一半。最大的島嶼國家為巴布亞新幾內亞。領土約十七萬七千平方公里（並不比日本大）、人口三百萬（約香港的三分之二），其餘地方總人口不到一百萬。幅原小、遠離大都會中心、分散於廣闊的海洋、易受季節性暴風雨的侵襲，這些是不利於發展的因素。其他困難還有交通與行政管理費用高昂，經濟高度仰賴外貿，易受世界市場波動的影響，本地技術與企業精神不易孕育，難於產生資金，這些都是嚴重的限制因素。本區域幾乎所有國家的人口都不斷地激增，而活躍於勞動市場的人口却偏低。惟因人口外流至紐西蘭與美國，人口增長稍為緩和。

在這些限制下，所羅門羣島、東加、瓦奴阿土平均國民所得約五百美元，而斐濟約二千美元。蔗糖出口價格雖下跌，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二年期間斐濟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增長三·四%。經濟有優異表現都是多元化經濟，尤其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所羅門羣島。他們吸收若干外資來開發礦產、森林、漁業、農產加工。其他小型經濟則以開發關鍵資源來支撐其自發自立的經濟（譬如諾魯盛產磷），或利用地利之便（美國薩摩亞發展漁業加工）。其他地區諸如東加、庫克羣島、吉利巴蒂、土瓦魯等，經濟多元化並無太大進展，因此無法建立一個自發自立的經濟成長。平均每人接受外援雖多，惟幾乎不能擴大生產性的就業機會，却有助於改善其基本生活。

太平洋島嶼的經濟遠景不確定。環太平洋區域經濟活躍地區使他們有機會擴大發展觀光，得利用外資來開發其他地方所需的礦、漁、農產資源。他們的未來取決於這些島嶼政府是否能制訂克服這些難題的經濟政策，充分利用經濟良機，並培養此地所需的技術。遠景最好的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擁有豐富的可開發的資源，特別是金、銅、林、漁資源。斐濟、新蘇格蘭，再等而下之索羅門羣島、瓦奴阿土也有若干機會，得以發展觀光、漁、林、農產品加工。至於其他小國或領土，縱有機會發展漁業，但缺少其他有利因素，前景黯淡，未來可能要仰賴外援。

亞太地區千殊萬別，經濟呈現千方百態，提供了正負二面的發展策略與經驗。日本與新興工業國家達成高收入的成長與所得公平分配，普受亞太地區與開發中世界的注意。舉例而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官方政策刻意模仿東亞的經濟發展，外貿導向策略也激發中共進行新經濟政策，並引起南亞決策者的興趣。

各國均依其特殊政經文化環境來制訂經濟政策。有的將財富公平配置於經濟成長之上。除開政治文化差異外，幅員大小也產生經濟差異，因此不能生吞活剝地套用這些發展模式，像疆土遼闊的中共與印度，以及島嶼小國。然而若干政策有極大的關聯性，諸如工作誘因、激發競爭、儲蓄、投資，以務實匯率或清除貿易障礙來促進貿易。

比較發展策略與經驗將是未來幾年亞太地區政策研究的重要課題。其他國家將有興趣深入瞭解，究竟是何種經濟政策與非經濟因素，促成該地區的高成長與所得平均。

(本文譯者為本中心研究員兼經濟組副召集人)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中共與宗教

本書由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召集人汪學文主編，本中心研究人員汪學文、朱文琳、邢國強、廖淑馨、江振昌、陳永生、葉釋英等合著；內容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宗教觀、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共與天主教、中共與基督教、中共與佛教、中共與伊斯蘭教、中共與道教等。全書廿二萬字，計四〇〇頁。實售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精裝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九九二一轉二二六